

「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工作坊
會議報導

**A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ceptual Change and Identity
Making in Modern East Asia” and
“The Workshop for Chinese Ident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ate”**

潘 少 瑜^{*}

鍾 欣 志^{**}

Pan Shaw-yu

Joscha Chung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作者係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曾赴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訪學。

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所主辦的「『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工作坊」總共為期三天，於2011年11月18至20日舉行，地點在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會中海內外學術界嘉賓雲集，各自對東亞觀念史研究的相關主題提出了許多寶貴的研究心得，本文略述大會經過。

第一日

會議上午九點開幕，由政大吳思華校長、周惠民院長、金觀濤講座教授、德國海德堡大學瓦格納（Rudolf G. Wagner）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梁元生院長等學者致詞。致詞中提到，當今的電子資料庫如「《申報》數據庫」、上海圖書館的「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金觀濤和劉青峰兩位教授所開發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等等，已經將人文學科的研究帶入新紀元。這項或可稱為「數位人文學」的新興領域，以及應用GIS、雲端技術等高科技創造出的研究新路徑，均待學者共同努力。另外，在各單位陸續投入大量資源建設資料庫的同時，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勞動（duplication of efforts），也有賴不斷的互動交流。

接著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發表與交流。此數據庫原本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計畫，收錄1830-1930年間以思想史為主的歷史文獻，總字數為1.2億字。金觀濤和劉青峰教授來臺後，由政治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合作，接續發展、完善之；目前兩校針對過去累積的數據內容不斷改善使用介面，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線上的檢索功能。研討會現場，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葉子菁小姐和政治大學張靖怡小姐代表，以多媒體呈現演示了雙方為這套數據庫分別開發的多功能檢索方式，其中包括正體字和簡體字的跨越、超連結的設立、針對檢索結果的後分類等等。

茶敘後是兩場專題演講。首先由金觀濤教授演講「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以東亞觀念史為例」。金教授從西方史學家的研究談起，介紹概念史和思想史領域背後的基本理念。他認為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在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基礎上，確認了歷史研究與自然研究的分野。研究人類歷史，無法僅止於事件是否發生、發生了什麼的層面，尚需探究為何發生，即事件背後的成因。人類行動必然牽涉動機，而動機必然涉及行動者具有的觀念。於是，對柯林伍德來說：歷史是活著的過去，任何歷史問題背後都是思想史的問題，而人類歷史知識勢必濃縮在思想史當中。在假定古今基本觀念不變的情況下，我們自然可從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角度研究古代社會；然而，面對社會轉型時期，例如西洋或中國近現代的劇烈轉變，我們無法先行懸置觀念，假定其未嘗改變。金教授舉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從一百多個德語辭彙的研究中，看見1750至1850年當地社會轉型為例，進一步說明觀念史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重要性。¹

接著是劉青峰教授的專題演講「數據庫的方法和意義」，她認為經由數據庫所檢索出來的大量文獻資料，可以幫助觀念史研究學者更貼近歷史事實，因為這些鉅細靡遺的資料具有可驗證性和具體性。例如以數據庫資料探討「科學」一詞的原意為何，考察它從何時開始取代傳統的「格致」一詞，而「科學」和「民主」在五四時期報刊中的實際使用頻率又是如何等等，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夠糾正一般的誤解，從而開拓出新的研究議題。

¹ 瓦格納教授在現場特別提醒，柯塞雷克當年的研究假定德語的獨立變遷，與歐洲多語、多文化的現實並不相符。即便他在書中引用不同語言的原文，顯示作者的多語思考能力，但在書面上，卻以呈現德語為主，而不提歐洲各地大範圍的互動情況。瓦格納教授的提醒與他本人跨文化、跨語際的研究視角密切相關，這部分可另參考他在會議中的專題演講，以及他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期所發表的〈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局勢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一文。

午餐過後是《東亞觀念史集刊》的創刊發表會。這是一份具有強烈企圖心和宏觀視野的研究刊物，其學術關懷主要在於東亞地區的觀念變遷，而理想則為跨文化、跨語言、跨領域、跨國界之學術研究。編審委員會由國內外數十位重量級學者組成，2011年12月（配合本次會議，提前在11月）出版的創刊號分為五個專欄，共刊登13篇論文。「特稿」欄位係國際知名學者的傑出論文，首先刊登瓦格納教授最新發表的長篇研究，預計分三期連載，極富學術交流意義。「專題」欄位以符合當期企畫之特定主題，具原創性之學術論文為收錄原則；「一般論文」欄位係由海內外學人自行投稿，不限主題，惟須與「觀念」研究相關；「關鍵詞報告」欄位主要以編寫詞條之方式，進行各種關鍵詞之歷時性觀念系譜梳理；「研究通訊」欄位，係提供國際學者交流對話的學術園地，舉凡研究綜述、書評、文獻介紹、研究新獻、意見交流、會議介紹、採訪報導、研究動態等，皆為刊載內容。

隨後是本次會議首度論文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魚宏亮發表〈範式的轉變：重建觀念史圖像中的歷史真實——新方法與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一文，以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與新方法為中心，對新技術與新視野條件下傳統文本的解讀、數據庫的應用、觀念圖景的建構等問題做了介紹與評價。第二篇是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方維規的〈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論價值轉換與觀念嬗變〉，論述中西接觸在中國所引起的價值轉換及其歷史背景和思想基礎，從各種雙語辭書入手，探究“culture”和“civilization”等字詞的翻譯，並勾勒文化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流變，以及「文明」概念的具體運用。第三篇是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李炯丘教授的〈韓國概念史研究的展望〉，指出韓國學術界從1980年代開始進行觀念史研究，近年來特別受到德國的觀念史方法論影響，各大學機構所主持的長期研究和出版計畫也蓬勃發展，然而目前的研究視角仍多受限於

「傳統——現代」、「衝擊——反應」的二元對立模式，亟需突破。²

茶敘後舉行「觀念史研究與數位人文學」專題座談，座談由北京師範大學方維規教授主持，由金觀濤教授、韓國翰林大學梁一模教授與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劉吉軒教授先行引言，然後開放自由討論。在座學者指出，「數位人文學」的研究方法特色在於結合電腦和人文，經由科技方法探討人類社會的問題。這門學問並非利用電腦進行計量歷史，而是參考數位科技所提供、過去無法取得的數據結果，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不過，後者也帶來許多過去未曾面臨的挑戰。部分與會人士仍對「數位人文學」有所疑慮，例如目前的電腦技術在分析解讀圖像方面的困難尚未解決，以及此種研究是否能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其理論或方法是否與過去的觀念史方法有異等等。

第二日

19日早上九點半由瓦格納教授的專題演講開場，他以“Concept, Metaphor, and Image: The Transcultural Adaptions of the Image of Dividing Up the Nation”³爲題，爬梳晚清流行的「瓜分」一詞的跨文化歷史淵源，從原本外國報紙上指稱歐洲列強分割波蘭、土耳其的詞語“partition”或“Aufteilung”如何被梁啟超等人翻譯成「瓜分」，進而成爲強而有力、廣爲傳布的政治隱喻。瓦格納教授以投影片展示了當年大量的中、外報刊圖像和相關文獻，說明1900年前後西方報紙對於瓜分中國的熱烈討論其來有自。如演講題目所言，以「瓜」隱喻中國現況，本質上是項跨文化的概念，此點從歐洲境內到中國口岸出版的外文刊物，再到中國知識分子創辦的中文刊物，有其脈絡可循。瓦格納教授並指出，中國最終免於受到瓜分的主要原因，在於列強之間

² 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見李炯丘教授發表於本期「研究通訊」欄的文章“Korea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Modern Paradi”。

³ 作者譯：「概念、隱喻和意象：分割國族的意象的跨文化挪用」。

的利益衝突。

之後的論文發表會討論三篇論文：首先是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的〈從「啟迪民智」到「陶鑄國民」——清末國民必讀書與國民性形塑〉，以國民性形塑為切入點，分析清末時期編纂的《國民讀本》、《國民必讀》、《公民必讀》初編、二編、《國民必讀課本》等教科書之內容。第二篇是臺灣大學臺文所黃美娥教授的〈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文運動與臺灣文學〉，分析魏建功以臺灣方言推動國語運動的文化思維結構，指出此後引發的方言書寫與臺灣／中國文學的多元互動關係，十分立體地陳述了戰後初期臺灣不同語文群體作家置身國語運動的處境。第三篇是政大中文所博士生邱偉雲與金觀濤、劉青峰兩位教授合著的〈中國主權觀念的形成：從「前概念」到「概念」〉，聚焦於1830-1930年代的政治類史料，利用數據庫提供的材料進行歸納分析，指出中國近代「主權」觀念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描繪出觀念的動態結構，以及近代西方民族國家「主權」觀念如何被引進中國的歷程。

午餐後進行「中日韓關鍵詞與觀念史研究」專題座談，受邀發言者包括方維規、梁一模、沈國威與臺灣大學歷史系甘懷真諸位教授，分別就相關議題提出自己的觀察和想法。方維規教授提到德國式的關鍵詞研究，例如德國哥廷根大學目前正在進行的「學術漢語資料庫」計畫，與「觀念史」的研究路線不盡相同，如何兼顧中西知識板塊，是學者需要努力的目標。梁一模教授說明韓國的現代性問題有其特殊性，許多用語來自中文和日文，是「沒有翻譯的翻譯」，不能以一般所謂「翻譯的現代性」來詮釋，因此歷史語義學的方法更為重要。沈國威教授簡介了日本晚近與東亞近現代觀念相關的關鍵詞研究，也期待韓國學者對於現代化進程中並未通過造字所產生重要關鍵詞，能有更為深入的查考，以增進其他國家學者的知識。甘懷真教授介紹了他在臺大所參與的「東亞儒學」研究計畫，以及過程中他和黃俊傑教授曾經面對過的各種問題，勾勒了本地學界在東亞研究方面的現況。從

東亞儒學所衍生出包括東亞研究、經典詮釋等方面的研究，均顯示東亞文化的多元特質，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定義——甚至，要在什麼單位（國家？抑或地區？）的基礎上談論多元，都有必要重新界定。

下午專題演講的主講人是王汎森院士，他以「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近代中國主義觀的形成與變遷」為題，著重探討「主義」此一觀念的起源與變化，並且旁徵博引，以諸多例證說明各個時期知識分子對於「主義」的理解。王院士首先概述中國的「主義崇拜」，突顯「主義」對現代中國人的支配力量，說明他研究「主義為何物」的動機。王院士的考察指出，黃遵憲（1848-1905）在《日本國志》書中第一次使用「主義」一詞；而在1900年以後，「主義」走向了剛性化、組織化，不再屬於個人，而屬於群體組織——特別是政黨。1916年以後，「主義」和「公理」、「進化」等觀念結合；而到了1920年代，中國進入了「主義化」的時代，從五四時期的多元思想，改變為單一主義信仰，「主義」成為解決人生問題的萬靈丹，不論個人（如瞿秋白（1899-1935）、陳獨秀（1879-1942）、柔石（1902-1931）、毛澤東（1893-1976））或社團（如少年中國學會），都像傳染病般，彷彿不緊抱某一主義便落於人後似的。1920年代中期之後，「主義者」進而成為一種新的身分、新的功名，黨的信徒取代了舊紳士，成為新的社會菁英。北伐後，國民黨借鏡蘇聯，黨和主義和軍隊的結合，使得主義成為「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而當時除了三民主義，更有「三愛主義」、「四民主義」在各地出現。幾十年之間，「主義」在中國從全新的辭彙，成為至高無上力量的代名詞。

第三日

20日由鄭文惠教授主持的專題座談「小報娛樂文化與近代文學期刊數據庫的發展」開場，與談人為美國波士頓大學葉凱蒂（Catherine Yeh）教授、加拿大約克大學季家珍（Joan Judge）教授，

以及香港科技大學陳建華教授。葉教授認為近代小報的定義並不清楚，而是在跟大報的不斷競爭中尋求自己的定位。清末民初的小報不像大報一樣從災難或經濟的角度解釋世界，但同樣強調求真求實的精神，因此小報不應只被當作歷史材料來運用，本身便是極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否則對小報的認識將過於狹隘。小報在當時的巴黎、東京和上海，報導和關注對象非常一致；小報作為一種文體，有著非單一文化圈可以控制的獨特性格，不論是對娛樂事物的重視，還是各式文類的相似性，都可看出此跨文化的特點。娛樂小報對社會進程的影響可從許多方面加以觀察，葉教授舉了明星文化的形塑（如開始吹捧梅蘭芳，使得大報也開始出現「梅訊」一類的欄目）、「世界」從晚清開始成為娛樂名目，以及很早就出現的大量連載小說（包括創作和翻譯）等例子，強調小報研究足以改變我們對文學史、文化史的看法。葉教授也花了點時間，為大會簡介她五年以來在海德堡大學帶領學生創立的“Chinese Entertainment Newspapers”資料庫。⁴

季家珍教授主要介紹並演示了“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資料庫的介面，此資料庫中包含《玲瓏》、《女子世界》、《婦女時報》、《婦女雜誌》等四種期刊，檢索方便，是目前季教授的研究計畫“A New Approach to the Popular Press in China: Gender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1904-37”的成果之一。⁵陳建華教授則分享了他對上海小報和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研究心得，提到這方面研究對傳統文學史建構的補述與改寫功能，也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想像空間與全球性的視野。繼三位與談人之後，瓦格納教授

⁴ <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xiaobao/index.php?p=start>；進一步關於葉凱蒂教授的演講主題，亦可參見她最近發表的文章 Catherine Yeh, “Guides to a Global Paradise: Shanghai Entertainment Park Newspapers and 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Urban Leisure,” in *Transcultural Turbulences: Towards a Multi-Sited Reading of Image Flows*, ed., C. Brosius and R. Wenzhuemer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11), 97-131.

⁵ <http://womag.uni-hd.de/>

也向大會推薦了海德堡大學近年開發的「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y”資料庫，其中收集了清末天主教會在中國出版的九千多本的書籍資料，相當具有參考價值。⁶

第三場論文發表會於茶敘後展開，發表的三篇論文裡，第一篇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光哲的〈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以「殖民地」為例〉，文中認為孫中山所創造的「次殖民地」一詞，脫胎於1890年代的「新名詞」——「殖民」，同時又衍生轉變為「殖民地」。到了1900年代初期，「帝國主義」一詞開始風行，成為另一個「規範辭彙」，並與「殖民」、「殖民地」相結合，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秩序」的認知。孫中山在這樣的時代思想脈絡裡，創造出「次殖民地想像」論述，做為革命的指導方針。第二篇論文是政大中文博士陳碩文的〈「浪漫、傳奇、羅曼司」以外？——從翻譯新名詞／新文類“Romance”論徐訏早期的小說〉，採用文類研究的思考方法探討徐訏早期作品的文學特質，考察其作品的文化意涵，指出它們繼承了「傳奇」記異事的傳統，加入當代思想和體驗，並將對當代生活的觀察與感懷編入通俗化的小說創作，雅俗共賞，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空間。第三篇是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蔡祝青的〈學科新名詞的標準化歷程：以晚清《英漢辭典》編纂「文學」觀念為中心〉，透過梳理晚清學科術語的標準化歷程，探索「文學」觀念的現代化發展，文中主要以《英漢辭典》的編纂為考察對象，並參酌清廷制訂「正典」機構的脈絡化歷史，得知最遲在1904年左右，中國社會已普遍有要求新名詞、學科術語標準化的籲求，而英漢辭書的編纂目的也逐漸改變，力求帝國現代知識能以科學系統的方式譯介輸入，以達中國之富強。

⁶ <http://kjc-fs2.kjc.uni-heidelberg.de:8600/exist/apps/wsc/modules/search/index.html>，注意此資料庫不支援IE，建議使用Firefox、Chrome或Safari等軟體瀏覽。此外，上述三種資料庫的連結匯整於<http://www.asia-europe.uni-heidelberg.de/en/hra-portal.html>，皆可在頁面左邊的目錄中找到。

午餐之後進行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的專題演講：〈「天下」到「萬國」與「華夷」到「中外」——明清世界地理知識建構中的觀念演變〉，鄒教授以投影片展示並介紹多幅珍貴的古代地圖和圖說，包括《山海輿地圖》（仿本）、《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以及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輿圖說》和《七奇圖說》等，闡述明清時期天主教傳教士對中國人的世界觀的影響。有意思的是，或許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中國人最後所接受的地理知識和傳教士所傳揚的知識之間仍有差距。

最後一場論文發表會包括兩篇論文：首先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爽學的〈阿哩原來是荷馬！明清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探索古希臘荷馬史詩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文中指出，在晚明時期，荷馬（Homer）「隱身」在耶穌會的譯作如《二十五言》、《達道紀言》之中，他的名字被譯為「阿哩汝」。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如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1640）、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等人對荷馬評價多為負面，到了清末的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 1803-1851），才不再從宗教與倫理學的角度批評荷馬，並承認英雄行徑方為史詩歌頌的對象。此後又有倫敦傳道會會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大力介紹希臘文學，寫作〈希臘為西國文學之始〉、〈希臘詩人略說〉、〈和馬傳〉等專文，將荷馬比為杜甫，且以「詩史」稱呼荷馬之作，貢獻極大。第二篇論文是臺灣大學潘少瑜助理教授的〈轉譯的現代性：英國維多利亞羅曼史的東亞旅程〉一文，以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一部頗受歡迎的羅曼史 *Dora Thorne* 為例進行文本考察，一方面將它置放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全球脈絡中，爬梳其諸多譯寫文本（包括其日譯《乳姊妹》、中譯《紅淚影》等）的來龍去脈，並測繪維多利亞羅曼史在東亞地區的傳譯旅程；另一方面，則分析其傳遞衍變之中現代性課題的轉譯現象，以及域外想像與中國文學經典的嫁接融合，以說明此種譯寫文本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論文發表後，由金觀濤教授主持最後一場以「觀念、知識與認同：觀念史研究與展望」為題的專題座談。與談人包括瓦格納、韓國翰林大學宋寅在、潘光哲、鄒振環諸位教授，談到的議題頗為廣泛，大致包括：語言的文化交流是否適合局限在「國家」的範疇內進行研究；學科、文化的認同問題；針對「共同知識文本」的更加精確的調查研究和概念的傳輸問題；更多已開發或開發中的資料庫（如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數據庫」）對學者（如文獻學的師生）帶來的挑戰等等。上述發言——特別是對「觀念史」研究路徑的重要性——引來在座其他學者頗多認同，也有學者展望未來「數位人文學概論」的撰寫、將此種學科方法落實到研究生之學術訓練的可能性，以及面對大量資料庫和觀念史研究路徑時，研究者具備問題意識的重要性。

三天的精采議程在簡短的儀式後結束。從最後一場專題座談的踴躍發言和與會者意猶未盡的神情，可知本次會議十分成功，也毫無疑問地展現出，近現代東亞文化的相關研究，仍有許許多多有值得投入的議題和發展空間。

（責任編輯：詹荃亦）